

全球化、區域整合與中國崛起的條件*

蔡宏政*

由於中國的規模巨大，它在世界經濟結構中的浮沈將直接改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資源配置，因此中國是否崛起必須放置於世界經濟與權力結構的可能改變來評估。在這篇論文中，我們論證中國的崛起是植根於「全球化」的結構轉型，然而，與一般主流的解釋不同，我們認為，把全球化當成全球要素價格均等化是一項迷思，推動全球化現象的核心動力必須從美元金本位轉變為後來的美元本位來理解。美元金本位賦予了美國發行超過其黃金準備的美元，美元本位則更進一步地擴大美國從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鑄幣利得（seigniorage），這一金融優勢使美國可以用信用賒欠的方式使用了遠超過其國內生產力的全球物資，並使得全球的經濟增長建立在美國市場的增長上。美元本位在1980年代的危機一方面造成拉丁美洲國家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結構調整」，另一方面則推

*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劃「全球化與區域化下的中國發展」（NSC95-2412-H-343-011-MY2）之部分內容。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的修改建議。

*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inghamton）社會學系博士。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動了東亞區域產業分工的轉型，使得中國接受大量依賴美國市場的出口導向外資。雖然出口導向工業化帶來中國GDP與外匯的快速擴大，我們論證，中國的崛起卻必須以走出「美元循環」為前提，要達到這一目標，中國除了必須進行產業升級外，還需要進行更深層的社會與政治改革以擴大內需規模。

關鍵字：全球化、美元本位、東亞區域性、美元循環、產能過剩

本文是對「中國崛起」究竟具有什麼樣的現實條件，以及未來又會面臨何種待解決之挑戰的評估。「中國崛起」這一議題的重要性在於，不管是以人口或是地理面積而言，中國都是一個規模巨大的國家，它的融入或不融入整個世界體系都會對既有的結構產生衝擊。這一特性使得我們在論證中國未來的發展，特別是「中國是否崛起」這一命題時，需要從世界性的廣度來理解，才能獲得比較精確的意義。然而，大規模的變遷常常不是能夠在短期間內完成的，因此對世界性變遷的分析又必須放置在長期的歷史架構下來理解。

以世界性、長時期的架構來理解中國發展將會涉及到龐大複雜的各種變數，因此分析的成功與否涉及到一個關鍵性概念的適當取舍。我們將以「全球化」作為主要的分析概念主軸，這不只是因為「全球化」是過去十年來最為人們所熟悉（或誤解）的概念，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胎動以來的「全球化」對整個世界體系與中國都標示著一個發展上的結構性轉向。因此，在第一部分中，我們首先要對「全球化」的主要理論進行檢討，指出它們在解釋上各自的特點與不足之處。在接下來的第二

部分中，我們提出美元本位作為「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為了闡明此點，我們首先分析了戰後全球金融體系如何從美元金本位轉變為美元本位，然後在美元本位的運轉中，一個跨國流動的投資、生產分工、與貿易網絡逐漸形成，成為今日人們所熟悉的全球化現象。

全球化雖然是一種跨國的影響力，但是對世界各地的影響卻不是均勻的，甚是於是異質的。第三部分主要在討論美元本位做為全球化推動力如何型塑了東亞區域的特性（regionality），這一區域特性又如何中介了世界體系與中國發展的歷史交會（historical conjuncture），它引入了中國日益崛起之發展條件的同時，也帶進了世界體系加諸在中國進一步發展所必須面對的挑戰。最後，我們則以數據資料，論證了中國進一步發展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包括發展中國自身的內需市場，以及人民幣升值後的產業升級。

一、全球化理論的檢討

（一）新古典經濟學觀點

1990年代以來對全球規模的社會經濟變遷的顯學非全球化理論莫屬。全球化命題最一般的解釋是，由於資訊傳輸技術的進步，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與技術）將因「要素價格均等化」⁽¹⁾的力量，更加地依據

⁽¹⁾ 「要素價格均等化原理」的數學證明雖然頗為複雜，而且有著一些模型上的假設，例如：交易雙方有著相同的生產技術、規模報酬不變、資本與勞動力的轉換沒有交易成本等等，但是它所發揮的市場機能在直觀上卻不難理解，它是在說明在同一個市場中，兩個相同的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本、

全球市場的資源有效配置來進行跨國流動，個別國家的管制力量將因此進一步萎縮。隨著各種跨國經濟活動的增強，政治、文化、資訊、移民、甚至於犯罪組織的「跨國」流動（*trans-national flows*）也在廣度與深度上隨之增強，而非僅僅只是過去「國際」間流動的總和（*aggregation of inter-national flows*）；也就是說，全球化呈現出一種超越傳統民族國家體系所能管制的跨國流動新結構。大前研一則直接以「民族國家的終結」（*The End of Nation-State*）來描繪一個全球資本主義的出現。他的主要論證是無障礙的資訊全球自由流動將使消費者的消費行動是以全球為導向，而資訊技術的進步也使得全球生產以最佳的比較利益來組織得以可能，從而帶動了全球性的跨國投資網絡。傳統民族－國家在這一新的全球資本主義結構中因為不再是最有效率的生產單位而變得落伍了，因此對於依舊以傳統民族－國家為單位來定義自身之國家利益者，大前研一認為他們是錯認真正的國家利益之所在，並且是自外於未來的前進的契機（Ohmae 1995: 28-42）。

如同我在「無疆界的世界」及其他地方所論證的，在今日知識驅動的經濟中那些把國家利益保護其國內稀有資源的國家，如巴西、印度、澳大利亞、以及中東的產油國，將會遭逢「資源幻覺」（*resource illusion*）的難題。以保護國家利益為名，他們其實是自外於全球最強有力的成長引擎（Ohmae 1995: 60）。

勞動力）由於自由競爭的關係，其價格將逐漸拉平而趨向相等。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自由的國際貿易中，兩國的生產要素會因為均等化的力量而發生流動，因此中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與土地就會引著世界上相對豐沛的國外直接資本。

對大前研一來說，持續深化中的全球化浪潮將把傳統的「民族－國家」轉化為區域國家（*region state*）。一個區域國家必須大到足以提供一個有最新發展的尖端產品，同時也必須小到足以使其公民能以消費者身分共享其集體利益。因應這樣的趨勢，大前研一提出了廣東、福建、香港與台灣應該合而為一成立「南中華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outhern China*）（Ohmae 1995: 89）。因為照大前的解釋，中國近20年來的經濟成長主要是外資在全球化趨勢下，大量往中國沿海地區集中所造成的。而中國政府不但沒有改變區域及城鄉間的不平衡發展，反而「對鄉下人民實施殖民式的剝削」，因此他認為與其說中國是一個大的國家，毋寧說它早已分化成六個區域國家（加上新加坡與西藏而成為八個國家），構成他所謂的中華聯邦（*the United States of Chunghwa*）（大前研一 2003: 31-60, 209-235）。

大前這種不可避免的區域國家（*region state*）趨勢之主張，根本言之，就是一種新古典主義的全球化觀點。這種觀點認為由於1980年代通訊技術的革命性進展，使得跨國投資、生產與貿易得以可能。而全球性的政治制度、社會互動甚至於文化價值都必須依循此一全球性市場之進展做相應的調整。事實上，資本與技術的跨國流動從來不只是單純地依據市場邏輯在進行的，同時也是在一定的國際權力階層結構下運作的。這不是說要素價格均等化原理是不正確的，而是說，對要素價格均等化作用的評估，必須配置在與之相對應的國際權力階層結構下來進行分析才能得到更圓滿的說明。因此，對這種自由市場的「高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論述，學界主要質疑在於全球化的經濟運作與維持必須根植於一個穩定的國際政治與社會調節機制，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程度越高，理論上就越需要一個全球性的治理架構來調節個別民族國家

之間的矛盾 (Held 1999: 1-10)。更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含藏在經濟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其實反映是少數核心國家單邊影響力之結構性重組，⁽²⁾而非如大前所言，是個別民族國家的主權與能力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擴張而在制度上全面性的衰退。

(二) 對全球化的質疑與再回應

對「高度全球化」論述的反對意見中，Hirst and Thompson (1999) 提供了一個立基於詳細數據的批評。首先，他們指出，如果我們以各國的商品貿易對GDP比例來代表國際經濟的開放與互賴程度，那麼1913年全球化的開放程度其實還高於1950年與1973年，甚至於到1995年的日本、荷蘭、英國都還達不到當時開放的水準。以跨國資本流動佔GDP的比例而言，1913—1914年才是全球化的高峰，而1990年代的開放程度事實上只及於1880年代水準 (Hirst and Thompson 1999: 27-28)。

其次，全球化理論宣稱國外直接投資已經重組全球生產網絡，而跨國公司則則是帶動這種資本與生產全球性重組的主要行動者。但是實際上全球75%的國外直接投資存量仍然集中於三大強權手中，分別是美國、歐盟、與日本，而82%的跨國公司仍然設置於其母國之中，也就是

14個OECD國家，並且以母國為主要的經濟活動重心 (Hirst and Thompson 1999: 66-75)。他們因此認為，國際經濟互賴不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新現象，它乃是自1860年代現代工業資本主義就已經存在的現象。這種國際間資本與貿易的流動是由國際間的主要強權來主導，而非超越國家控制的「全球化」。正如同1878-1914年的經濟互賴高峰是由不列顛霸權所支持的金本位所形塑，1990年代所宣稱的「全球化」其實也是美國、歐盟、與日本三大強權的政策協調的結果 (Hirst and Thompson 1999: 1-3)。

Held等人 (1999) 對Hirst and Thompson的論點提出回應，首先，就貿易佔GDP比重來說，他們主張如果我們重新修正固定價格與當年價格的差異，把服務產業的貿易(而不僅僅是商品貿易)考慮進去，那麼1913年左右的比例是否高過今日就大有疑義 (Held et al. 1999: 168-171。另請比較Hirst and Thompson 1999: 62-65對此的討論)。第二，在跨國資本流動方面，金本位時代資本的流動主要僅以歐洲為主，遠不如今天的廣度，因此全球連動的影響也比今日有所不如 (Held et al. 1999: 192-198, 222-223)。第三，雖然跨國資本的流動集中於核心國家，然而由1980年代資訊技術的進步，使得一個跨界生產網絡 (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 以及相應的全球生產管理成為可能。跨國公司因此能夠根據各國的產業優勢，分散其研發與生產活動，而非僅僅依賴於母國的資源，海外生產因此得以提升非核心國家的工業製造能力，這又是金本位時代沒有的現象，Held等人因此主張，就強度 (intensity) 與廣度 (extensity) 而言，資本、貿易、與生產組織的確都呈現一種史無前例的全球相互關連性，個別的民族國家的自主性雖不必然面臨終結，但是卻必須進行重構以面對新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運作方式 (Held et al. 1999:

⁽²⁾ Gilpin (2000) 就露骨地表示一種美國中心的全球化觀點：「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不可能在欠缺一個強力而明智的領導架構下還能存活。這種國際領導架構應該要能提升國際合作，以建立並執行管制貿易、外資、與國際金融事務的規則。…然而，自蘇聯的威脅結束後，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經濟的支撐基礎已經遭到侵蝕。要確保全球經濟的存續，美國與其他主要強權必須再一次地承諾齊心合力，以重建已經被弱化的全球經濟之政治基礎」 (Gilpin 2000, 3-4; 13-14)。

237-270; chapter 3, 4, 5)。

綜上所述，資本主義全球化較為精確之意涵至少應該包含下列三個互相關連的命題：第一、自1980年代以來，以全球為場域的跨國經濟活動（投資、生產、貿易）其強度與廣度明顯增加；第二、然而，這種強度與廣度明顯增加之全球經濟活動因為必須落實在一個個具體的民族國家中運作，因此也就涉及各民族國家如何設定各自的國家利益以因應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問題；第三、因此，在跨國經濟活動與個別國家的發展目標之間必須有一個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架構來進行必要的協調與管制，跨國經濟活動的增強必定有著相應的國際政治階層的調整，而這種調整的力量的持續掌控相對有利於位於階層上端的主要強權國家。

所以，全球化的經濟活動對應的是國際治理架構的轉變，在大前研一的論述中，政治的因素被完全的棄而不顧，國家幾乎是全球「資產階級的執行委員會」。另一方面，Hirst and Thompson則固守民族－國家體系的傳統觀點，忽略了全球資本、貿易與訊息的流動所產生的巨大變化，以及他們對國際權力階層所可能造成的衝擊。Held等人則試圖描繪一個由傳統世界逐漸向全球化結構轉型的過程，他們認為，推動全球化的力量除了資本主義與技術變遷外，還必須考慮更多不同的因素如政治、軍事、文化認同等。但是，除了蒐集豐富的資料來支持全球化現象，對於諸多個別因素如何互相影響而推動了全球化的開展，Held等人也僅止於「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全球化分析能夠正面處理這一議題」的結論（Held et al. 1999: 12）。

在這一篇論文中，我們以美元本位來解釋全球化的形成，並探討它對東亞區域經濟的影響，然後由區域經濟的轉型來衡量中國崛起的條件

與限制。但是我們並不是單一因果論者，因為美元本位是「引發」，而不是「決定」了，區域經濟的轉型，美元本位設立了區域經濟的轉型的初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s），但同時也發展了美元本位所未能完全決定的區域轉型與中國崛起的其他條件，事實上，美元本位同時也讓東亞與中國蓄積對它的支配性的挑戰力量。

二、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一個美元本位的觀點

（一）從美元金本位到美元本位的形成

正如Hirst and Thompson所指出的，1913－1914年有一波跨國資本與貿易全球流動的高峰，其中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當時的金本位制度提供了一個全球治理的金融架構來確保了跨國資本與貿易全球流動的穩定性。弔詭的是，金本位制度的主要缺點也正是因為它過於穩定，以致於對個別國家的發展目標造成束縛。在傳統的金本位貨幣制度時代（1870-1914），國家的信貸系統必須奠基於黃金庫存量，並透過固定匯率與其它國家連結。如果一個國家發生國際收支赤字，它的貨幣供應量就必須減少，從而導致商品價格下降。為了平衡國際收支赤字，這個國家就必須出口更多便宜的商品。因此一個穩定的世界經濟通常必須會以規制個別國家發展目標為代價。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各國開支劇增，國家為了戰爭的經濟動員與國內需求，紛紛與固定匯率脫鉤，使他們免受的固定匯率系統制肘，並建立貿易障礙來改進他們的國際收支，金本位因此也就迅速被各國拋棄。正如Gilpin所說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大結果是世界貨幣體系的國家化」（Gilpin 1987: 128），而在兩次

世界大戰之間的金本位重建行動又因為美國處理大蕭條的國內政策而再次瓦解。

因此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金融體系的重建主要的課題就是如何在國家發展和穩定世界金融秩序之間尋求一個穩定的平衡，這就是戰後一直到1971年間一個具有穩定的美元－黃金比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³⁾被創制的理由。布列頓森林體系開啓了一個美元等同黃金，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系統，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二組織則被建立來維持國際金融貨幣秩序和個別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作用在於監督國家的經濟成效和提供貸款解救那些經歷國際收支困難的國家。因此，那些有短期赤字的國家將不需要像戰前有同樣情形的國家，實行競爭性的貶值或者進口限制。另外，世界銀行主要則是為建水壩，高速公路或者電廠等國家基礎的工程提供大規模貸款。各國匯率則直接與美元，而非黃金，維持固定比例，使得布列頓森林體系比起金本位更具國際的金融靈活性。國家使用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貸款而有更多的能力在世界經濟體制中，透過協調過程來促進他們的國家發展。正如 Ruggie 說，這是一種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的妥協結

⁽³⁾ 在二次大戰末期1944年，由同盟國發起，在美國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布列頓森林集會簽訂的布列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成立了至今仍在運作且影響力強大的兩個組織－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此一系統下，各國貨幣先與美元作直接匯兌換算，釘住美元，美元則堅守1盎司黃金為35美元的官價。換句話說，這是一個以美元為基準，美元等同黃金的國際貨幣系統。

果：「不像30年代的經濟民族主義，它的性質是多邊主義的，也不像強調自由貿易和金本位制的自由主義，它的多邊主義是可以被各國國內的干預行動所修正的」（Ruggie 1982: 393）。

這個支撐戰後全球經濟高度成長的國際金融體系當然不是一種憑空的創制。在1947年美國擁有全球貨幣黃金存量的70%（Walters 1992: 73），因此，戰後全球經濟要持續運轉必須有賴於美國黃金以美元的方式持續地輸出。所以，即使美國在1945年佔有全球經濟輸出總值的三分之一，美國仍然需要保持國際收支赤字以便輸出全球經濟運轉所需要的資本（Rapley 1996: 35）。雖然作為全球金融體系的基準，美國並不能如同其他國家一般藉由調整匯率來增強其國際貿易競爭力。然而，美國卻享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有利之處。只要其他各國對美金保持信心，美國就可以藉由單純地印製美元來維持或甚於擴大其購買力。這種特殊的資本輸出能量再加上遙遙領先的工業製造能力共同支撐了美國在戰後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重構中的干預能力。在歐洲的馬歇爾計畫中，美國藉由輸出资本與技術來啟動戰後西歐的經濟重建。為了清償美援，西歐諸國則出口其工業製品到他們戰前的殖民地，這些戰前的殖民地則輸出工農業原料到美國以完成整個資本循環。戰後日本的經濟復興遵循著相同的邏輯，成為美國在東亞的主要戰略結盟對象（詳見第三節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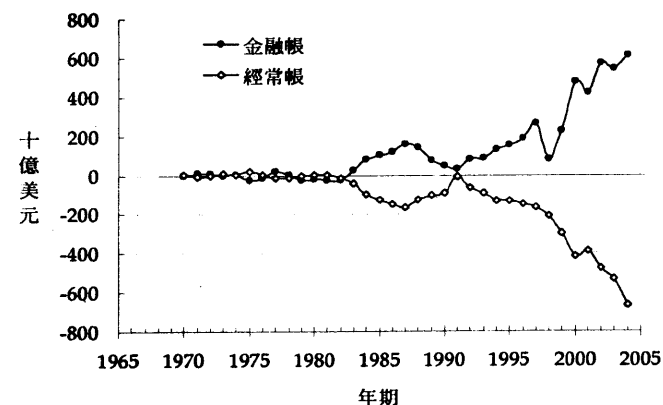
整個布列頓森林體系雖然維持了國際金融穩定與國家發展的平衡，然而這個體系的運作卻必須立基於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這明顯地是無法長久維持的。理論上來講，只要世界各國繼續保持對美元的信心，那麼布列頓森林體系的黃金－美元本位就可以持續運作。但是實際上由於美國發行的美元數量日益增加，以致於在1971年海外美元的數目已經超過美國黃金存量的300%（Walters 1992: 75）。這意味著只要少

數國家握有三分之一的美元就足以換取美國所有的黃金儲備。為了維持美國的政治與經濟自主性，美國總統尼克森遂於1971年宣布切斷美元與黃金的兌換關係。

在美元與黃金的兌換關係被切斷之後，國際金融從此進入浮動匯率的時代，理論上，美元只是所有國家貨幣中的一種，其價值視與其他各國貨幣的匯兌比例而定。然而，美國在國際上的政治與軍事支配地位繼續支撐了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的計價單位，尤其甚者，美元因為切斷了與黃金的兌換關係而更可以不受拘束地印製，因此1971年之後，國際金融與貿易體系實際上是進入一個美元本位體制。這一體制最重要的特徵是容許美國以更自由的方式印製美元來進口貿易伙伴的商品，而美元則取代黃金成為各國主要的外匯儲備。美國的金融帳盈餘（也就是反映其經常帳赤字的規模）在1970年代之後開始穩定上升，而在1983年開始飆漲，1987年達於戰後的首波高峰。之後的規模雖然縮小到僅為92億美元，但是從此之後則以令人瞠目的速度飆漲到2004年的6126.9億美元（圖1）。

隨著美國的金融帳盈餘的飆漲，全球的國際儲備也同步上升（圖2）。從1987年到1969年全球的國際儲備成長了13倍，到2004年時候，漲幅已經達到1969年的63.7倍！全球儲備的巨幅上升是美國不斷輸出美元的直接結果，美元的輸出使得美國得以用信用賒欠的方式使用了遠超過其國內生產力的全球物資，提供維持美國全球性的政治、軍事影響力的物質基礎，而美國的購買力則成為支撐全球經濟成長的主力。美元的升貶與輸出量因此成為左右全球金融與產業結構重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下一小節中我們將論述，正是因為美元本位的危機與美國的因應措施，導致了拉丁美洲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策略全面被「結構調整」

為出口導向工業化，東亞的模式則被高舉為「奇蹟」，一個全球性的貿易與投資流動網絡才日益上升，成為今日我們所謂的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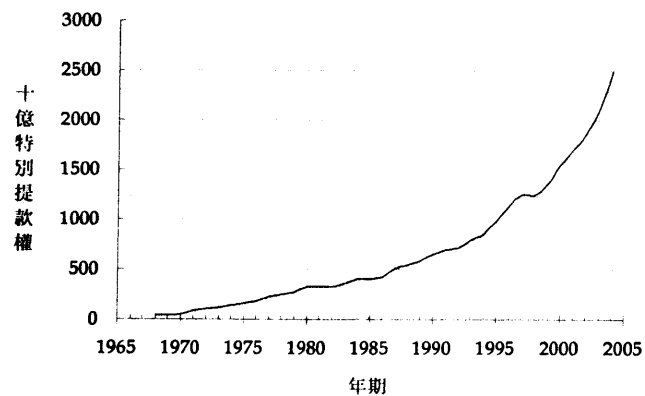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1997年以前的數據來自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1998, Pp. 894-895. 1998年以後的數據來自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5, Pp. 602-603.

圖1、美國的金融帳與經常帳

(二) 美元本位與「全球化」發展策略的論述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家發展策略是在戰後全新的國際政治架構下出現的，新的國際政治主要特徵是殖民的帝國勢力在亞洲和非洲的崩潰。從1945年到1981年，共有105個新興國家脫離殖民地地位而加入聯合國，使聯合國從51個會員國擴大到156個會員國。為了在政治獨立之外更進一步地追求經濟免於受到過去殖民地母國的控制，國家經濟發展就成為這些新近獨立的國家的主要目標。在殖民地政體下，殖民地通

常被有計畫的輸出初級原料以交換來自殖民母國的工業產品。透過不平等的貿易條件，大量盈餘被汲取。這種殖民時期的農、工不平等交換使得新興國家自然將建立國家工業體系作為他們的施政優先和當時提升政治獨立的最為重要的條件。在布列敦森林體系之下的美國資本輸出，則成為這些後進國家發展國家工業計畫的主要資金來源。



資料來源：1997年以前的數據來自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1998, Pp. 46-47. 1998年以後的數據來自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5, Pp. 24-25.

圖2、國際儲備的急遽上升

基本上，建立一個國家工業部門有兩種策略：出口導向工業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OI）以及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由於不同的地緣政治和歷史傳承因素，1960年代以來的東亞國家代表第一種模式，1980年代間結構調整之前的拉丁美洲、非洲、印度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則是第二種模式的典型。今天所謂的全球化，其實就是進口替代策略逐漸退位，出口導向

工業化則被提升到發展策略的全球模範的結果，而在美元本位下所做的金融調整正是造成此一結果的主要因素。關於東亞的情形我們將稍後詳細討論。底下先簡略地就拉丁美洲國家的進口替代策略如何被美元本位全面重構為出口擴張進行分析。

與那些在第二次大戰之後才脫離殖民統治的亞洲和非洲國家不同，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早在1820年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國衰落時，就已經爭取到他們的政治獨立。然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卻仍然維持著殖民地時代的分工模式，拉美國家持續地集中於農業輸出，以配合歐洲工業金融集團的商業發展。然而，戰爭造成第一世界國家的需求下降與歐洲市場的喪失，對拉丁美洲的農業輸出產生巨大的衝擊，導致其經濟崩盤，而外匯的短缺限制了進口產品的能力。為了恢復拉丁美洲的經濟，政府面臨了工業化的必要性。透過建立國有企業並且鼓勵私營企業生產替代性商品以取代先前的產品進口，拉丁美洲政府滿足了內部的需求，並且在相當程度上保護他們自己免於世界經濟不穩定性的影響。在一些發展經濟學者的幫助下，二次大戰前的進口替代在戰後被發展成一項更有系統、長期與綜合性的國家建設工程。

Raul Prebisch (1950) 和Hans Singer (1950) 在各自獨立的研究下得出相似的結論，指出在一個越工業化的經濟體中，資本將越集中在那些少數高獲利的公司裡。但是由於生產者過剩，傳統初級產品面對的是一個買家市場（即賣家的價格競爭）。工業化的產品的價格上漲比農業產品的價格快。如果拉丁美洲需要增加從核心國家進口工業化的產品，就必須輸出甚至更多農業產品，也就是貿易條件之惡化（declining terms of trade）。Ragnar Nurkse (1961) 替這不平等的交易補充兩點。第一、初級產品的消費彈性曲線較工業產品的曲線為低，工業產品因而可以不

斷推陳出新，提高其新產品之利潤。第二、工業產品可以透過發明替代品來降低對於周遭初級輸出產品的需求，例如糖膠樹膠（chicle）之於口香糖。唯一解決之道是在於改變生產結構。邊陲地區經濟必須倚賴更多的工業出產而不是初級產品輸出。因為這種發展方式是要去除邊陲國家工業化發展的結構障礙，所以被稱為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為了促進國家工業化，過去工業產品的進口通常透過關稅或者非關稅壁壘來限制的，政府也透過限制公司的數量來保證國營企業的利潤。為了降低進口成本投入，本國貨幣被刻意提高，因此擴大國營企業的利潤幅度。因此，本國貨幣的升值實際上是一種把資本由農業部門轉移至工業部門的發展策略措施，原料或者農業產品輸出所累積的國際外匯，被不對等地配給到需要進口輸入的工業部門，而農產品透過課稅和國家壟斷主要食品的方式來維持低價格，以幫助工業部門保持工資低廉。

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方式在戰後的後進國家中獲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巴西在1950到1978之間的工業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上擴大十倍，在這28年中達到8.5%的GDP平均成長率。這個數目是5倍於六個鄰近南美安地斯山脈國家(Gwynne and Key 1999: 72)。在1970年前，墨西哥每年GDP平均成長率則達到6.5%。另一個顯著的情況是印度，在其第一個五年計畫(1951-1956)中的國家收入增長了18%，在前三個五年計畫上，鋼產量也增加六倍(Rapley 1996: 33)。從戰後到第一個五年計畫為止(1953-1957)，中國的GDP也以每年8.9%的速度增長，其中農業產出每年增長3.8%，而工業產出則達到18.7% (Lardy 1987: 155)。

雖然如此，但基本問題並未因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而獲得解決。如果農業初級產品對工業加工產品交換的貿易條件會惡化，低附加價值的加工產品對較高技術產品的貿易條件也同樣會惡化。在工業化核心國家

和邊陲國家之間的剝削，不僅僅是因為製造產品而發生的，而是因為生產的資本與技術的集中。一個真正的發展追趕必須是縮短或甚至於消除這種資本與技術依賴的關係。邊陲國家如果不能消除這種資本與技術的依賴關係，進口替代工業化就會繼續持續下去，進行第二次的進口替代工業化。

1971年的浮動匯率與之後的石油危機在拉丁美洲進口替代工業化的資金來源產生了結構性的轉變，浮動匯率增加了舉債發展的ISI策略的風險性。石油危機則一方面使得歐洲貨幣市場中不受美國政府管轄的美元（油元）遽增，成為國際廉價信用貸款的來源；另一方面，由於油價的衝擊使得由邊陲國家對核心國家的初級產品輸出縮減，導致它們的收入銳減，增加了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的不穩定。對應之道乃是為求提高產品附加價值而必須進行的第二次進口替代工業化，由於當時國際貨幣市場充滿著由跨國商業銀行掌控的低廉美元貸款，二次進口替代發展策略的資金因此不虞匱乏。

從發展策略自主性而言，邊陲國家更容易選擇從大型的國際商業銀行借款來投資他們的國家工程。因為它的償還條件比較容易討價還價，且相對於代表核心國家的多邊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來說，其相關約束也較少。因此，隨著1971年布列頓森林體系的傾頹，拉美邊陲國家就轉向滿手油元的跨國商業銀行取得進行二次進口替代工業化所需的資金。邊陲國家的債務結構於是被重新分配，在70年代早期，多邊組織的債款占總債務的33%，而跨國商業銀行只佔13%，到1970年代末期，跨國商業銀行的這一比率已經上升到60%，到1984年，美國排行前九大商業銀行已增發超過他們資產淨值100%的股票來借給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委內瑞拉 (McMichael 2000: 118-121)。

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的邏輯是，經過一段進口替代的建設時間，邊陲國家預期會以工業化來減輕對外的資本與技術依賴，然而這個W. W. Rostow所謂的「起飛階段」卻不會到來。由於美國債務在1980年代的急遽增加（請見圖1），為了對付通貨膨脹並吸收外資來降低嚴重的國際收支赤字，在1980年代中期美國透過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高的利率提高，來執行緊縮的貨幣政策(Arrighi 1994, figure 20)。這政策對那些負債累累的國家產生災難性的影響，一方面，美國汲取了那些被邊陲國家用來繼續發展的資金；另一方面，美國豎立的高利率水準導致償債成本超過了那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償還能力。

因此，和在貿易順差和技術方面取得可觀發展的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相比，核心國家面對金融危機的因應手段使得許多拉丁美洲的半邊陲和邊陲國家陷入債務陷阱中。負債國家持續地增加債務且無力如期償付他們的欠債，推翻了國家不會破產的神話。然而，不管私人銀行的組織多龐大，要求一個主權國家履行它的欠債義務，這仍是在私人銀行的能力之外。當拉丁美洲國家的外債如此之巨大，以致於某些國家利息的無法償還就足以導致眾多跨國銀行的週轉不靈，因此這些鉅額的債務流動就需要倚賴政治安排。最後，這些債務被轉移至到布列敦森林體系下的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等機構。到了1988年，這些「低度發展」國家的債務組成又再一次地被根本性的翻轉，只有6%來自跨國私人銀行，與88%的多邊組織貸款形成鮮明對比(McMichael 2000: 165)。

於是，戰後以援助國家發展的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在歷經1970年代的頹勢之後，在1980年代又重整旗鼓，以國際金融秩序管理者的身分呈現。透過多邊組織借貸，布列敦森林體系機構對拉丁美洲國家執行他們的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jects, SAPs)，強調出

口帶動經濟增長（貿易自由化和匯率改革），改進國內資本構成（稅款和金融改革），以及減少政府干預（見表1）。

表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世界銀行援助計畫的規制內容
(有特別條件計畫所佔的百分比)

條件	IMF, 1983-85	World Bank, 1982-89
金融改革	44	51
國營企業改革和私營化	59	65
貿易自由化	35	79
匯率行動	79	45
稅制改革	59	67

資料來源：Gwynne and Kay: 1999, 78.

結構調整計畫體現了新古典主義的觀點思想。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債務問題並未被視為世界資本主義結構性剝削與支配的問題，而僅僅被看作是流動性的短缺。因此解決之道被認為是可以透過擴大參與世界市場與建立貿易順差來改進。「多餘的」花費如社會福利、住房供給、教育和健康保險則應該被大幅度削減，因為這些政府花費排擠了私人投資並帶來通貨膨脹。國有企業需要私有化，因為它們是無效率且被腐化的權貴所控制。貨幣被貶值來刺激出口並透過引進外國資本財貨和技術來提升國際競爭力。貿易管制、金融和勞動市場將被鬆綁，以便於在世界經濟中尋求相對優勢的國家位置。透過這種模式，整個1980年代，拉丁美洲約40%到50%的出口被用來償還它們的債款(Walters 1992: 96)。結構調整計畫以全球市場參與，替換國家發展優先的理念。強調國家發展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被拆解，反之，東亞則因其出口導向發展的閃

耀表現而被稱頌為發展奇跡。一場新的全球性貿易、投資的自由流動與產業分工重構因此被推上歷史舞台，形成今日我們理解的全球化現象。

三、全球化形塑下的東亞區域整合

美元本位的危機處理所導致的全球化要求各國在貿易、投資的跨國流動上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然而由於不同的區域條件，它對東亞所造成的區域整合效果與拉丁美洲並不相同。東亞與拉丁美洲在發展上最大的差異是，東亞中的日本與四小龍，由於其地緣政治的關係，在美元—金本位時期就因為美國「邀請下的發展」，得以藉由對美貿易順差累積大量的美元。相對於拉美國家，日本與四小龍的金融優勢使得它們在全球金融轉向美元本位時，有較強的因應能力來適應1980年代國際上美元供給的波動。

事實上，以出口擴張帶動成長的日本與四小龍在1980年代中期對美元的匯率是急遽的升高，這一波區域貨幣的升值將東亞急速地推入了一個區域產業分工結構的重組過程，造成區域內的貿易與投資提升到戰後的最高點，形成東亞區域經濟的整合，而中國的融入則使得它在這一區域經濟整合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位置。不過，以一個能夠自我支撐（self-sustained）的標準而言，東亞區域經濟至少有兩個互相連結的結構性弱點，一是對美國的市場依賴，因此也就繼續受制於美元本位的規制，另一個是在產業技術上仍然處於由美國來支配的地位，因此在市場競爭上就繼續受制於美國的產品標準設定，其結果是東亞經濟的區域化在目前仍然受美國的制約。

（一）美元—金本位下的雁行秩序。

被IMF與World Bank稱許的東亞出口導向工業化同樣不是在政治真空中，由自我調節的市場「自然」產生的，而是在戰後以美—日同盟為核心的反共資本主義陣營下的地緣政治結構被形塑的。美國東亞戰略的最初目標是在解構日本軍國主義再次發動戰爭的能力。因此在整套的重建計畫中最主要的目標是拆除支持戰爭的財務引擎，日本財閥集團；民主化日本政治體系；以及改革日本的軍事文化。然而在1947到1948所逐漸出現的冷戰對峙急遽地改變了美國的東亞政策。日本重建計畫中的首要任務不再是社會政治改革，而是東亞的區域權力平衡。作為東亞在戰前唯一的工業國家，而且具備大東亞共榮圈所建立起來的的殖民地網絡，日本因此成為「亞洲馬歇爾計畫」的首選結盟者以防堵共產勢力的蔓延。整個日本重建計畫被逆轉其先前方向。戰前的財閥集團被重新組織起來，財經技術官僚與政治菁英也繼續被保留在戰後的權力階層中（Selden 1997）。透過韓戰的軍需採購，美元被大量地輸入日本以及東亞其他國家。日本則透過戰前殖民地網絡，自東亞及東南亞其他國家取得農工原料並回輸工業製品以平衡其美元短缺。⁽⁴⁾美國則經由開放國內市場，吸收東亞反共國家日漸復興的生產能力，將美元在韓戰、越戰之後，以貿易順差的方式持續地輸入這些盟國。

二次大戰以前，赤松要（Akamatsu Kaname）以分析日本的紡織業與機械工業為例來說明，一個國家的工業能力由後進國轉變為先進國將會經歷輸入資本財、建立國內工業、到有能力出口原先必須進口的商

⁽⁴⁾ Borden 提供了一個清楚的統計說明了亞洲市場對早期日本復甦的重要性，請見Borden 1984: 228。

品。每一個產業部門的比較利益將會隨著時間由低而達到最高點後下降，從而進行產業轉換，形成一種倒V字型的排列，就像雁群飛翔的隊伍一般。這個雁行理論在戰後與美國學者Raymond Vernon用來解釋生產的跨國流動所提出的產品週期理論（product life-cycle theory）相結合，被進一步地建構成根據“比較利益法則”理性而且互惠地形成的區域分工模式。小島清（Kiyoshi Kojima）就如此分別日本的國外直接投資與歐美跨國公司的國外直接投資。他論證道，歐美跨國公司的國外直接投資是在控制投資國的國內市場，並從而獲取其獨佔利益，歐美投資國因此是以損害地主國的國家利益來擴大自身之出口。至於日本的國外直接投資則是發展導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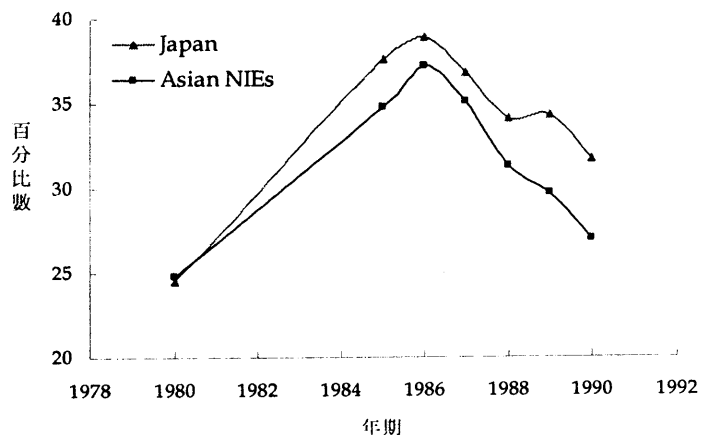
地主國擁有的潛在比較利益之所以無法實現，乃是因為欠缺技術、資本與管理能力。（日本的）國外直接投資將會幫助地主國實現它的潛在利益，並因此地主國的這些新產業得以發展成出口產業。同時，由於產業的轉移至國外，日本就能將資本與勞動力用於發展具有新的比較利益的產業。因此國內的結構調整就可以展開。比起沒有日本直接投資的情形，如此和諧地擴大之雙邊的貿易是更具互補性與更高的利潤，而日本與在地國的產業結構也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改善。（Kojima 1986:68）

在1980年代以日本為首的發展國家模型（state-led development model）像今日的全球化理論一般佔據著主流論述的地位時，台灣與韓國則是被認為成功地複製了日本模式發展而來的後進者（late comers）。東北亞的發展成就也就成為支持雁行發展模式（flying geese model）的

堅實基礎。在這個模式中，日本由於其資本與科技的優越性成為產品創新的區域源頭，不言而喻地也就攫取商品鏈（commodity chains）中附加價值最高的一部份。根據資本與技術密集程度及附加價值的獲取能力，日本依次將生產技術以國外直接投資（FDI）傳給第二梯隊的台灣、韓國、新加坡與香港，第三梯隊的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與印尼，以及後來第四梯隊的中國與越南。因此，一個「理念型」的雁飛行發展都是圍繞在以日本為首所垂直整合的區域製造網絡，以確保日本在東亞地區發展上的領導權。

因此，如果我們說日本是領導東亞國際生產基地的雁頭的話，那麼，整個雁群的飛行方向則是由美國的購買力來指揮的。沒有美國的市場，再怎麼有效率的東亞彈性生產組織或是發展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都無法完成一個完整的資本循環以產生資本積累。在1985年「廣場協定」（Plaza Accord）改變區域分工之前，伴隨著美國金融帳的大幅上升，是日本與四小龍的對美出口也逐漸提高，最高達到40%到35%之間（圖3），廣場協定之後這個比例則再現於中國身上（詳見第四節之說明），這個轉移過程的動力還是要回到美元本位制度的運作來理解。事實上，美元本位制度有一個根本的限制，一方面全球的經濟成長需要美元的輸出，但是另一方面，美國的輸出美元是有一定限度的，在達到此一限度時，美元對其他國家的匯率就必須進行調整，正是這種調整導致了原先雁行秩序的轉型，以及中國在1990年代被整合進入東亞「出口帶動成長」的發展模式。

（二）美元本位下的東亞分工重構與中國的整合



資料來源：Kwan, C. H. 1994.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ondon: Routledge. p102.

圖3、日本與四小龍的依賴趨勢

東亞的「出口帶動成長」模式依賴於對美國的大量出超，這些出超國持有大量的美元儲備會在該國的中央銀行進行匯兌，轉化為本國貨幣進入該國，由此產生了兩個相互依存現象，第一是各國央行持有的美元外匯要求一個適當的再投資管道，以確保其價值與盈利。在安全性與流動性的考量下，現實的情況是持有大量美元外匯的國家大多選擇購買美國的公債、公司債或股票，美國就以這鉅額的金融帳收入來融資貿易與預算赤字，繼續維持其購買力。第二，當美元儲備進行匯兌，轉化為某一國家的貨幣而進入該國時，它就造成該國的貨幣供給上升，其作用一如該國央行所注入的強力貨幣（high power money），將會在銀行體系中不斷的借支與儲存中產生信用創造的效果，從而提高該國的投資強

度，當外匯流入的速度非常快的時候，就會發生過度投資與產能過剩的現象。⁽⁵⁾過剩的產能更加依賴美國的購買力來吸收，因此也就加強了出超國對美國融資的必要性。換言之，美國以不斷印製的美元交換對美出超國源源輸入的商品，而這些輸出的美元又有一大部分回流到美國，用以支撐國對其他國家的購買力，美國由於其獨特的金融地位，得以用除借的方式使用著全球的資源。

這個「美元循環」的過程是以美國不斷高築的債務為動力，因此最終而言這一循環一定會遇到美元發行過多所導致的美元貶值與美國清償能力問題。每一次的美元貶值調整就會導致主要貿易伙伴幣值上升與對美出口的下降，此時，這些依賴對美出超帶動成長的國家就必須加強其資本輸出，以及尋求其它的出口市場。美國的金融帳盈餘（也就是反映其經常帳赤字的規模）在1983年開始飆漲，在1987年達於戰後的首波高峰，大量的債務使得當時的雷根政府不得不對主要貿易國施加壓力，要求他們的本國貨幣對美元升值，希望因此加強美國的出口能力，從而削減赤字，美國總體經濟政策的改變具體地表現在「廣場協定」上。

1985年9月，在美國的策劃下，7大工業國中的美、英、德、法、義5國財長與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的「廣場飯店」簽訂「廣場協定」（Plaza Accord）。以日本為首，東亞四小龍的幣值在1980年代下半葉開始大幅上升，並且在1995年以前維持著這波升值的幅度。相對地，在天安門事

⁽⁵⁾ 當然，央行可以發行國債將多餘的貨幣吸收進來，但是如果牽涉的金額過於龐大，或儲備資產增加過於快速，則發行國債所必需支付的利息代價可能就會太高而變得不可行。另外，央行也可以拋售美元以吸收本國貨幣，但是如此一來就會造成本國幣值的上升，對出口帶動成長的國家而言，這是極力避免的選擇。

件之後的三年，中國決定維持經濟開放的路線，持續地以吸收外資，擴大出口做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因此在1990年代上半葉也快速地貶值（表2）。因此，美國支配下的「美元循環」所積累的結構性美元貶值壓力導致了區域匯率的重新調整，而這種區域匯率調整帶來的對美出超國的升值壓力才以「要素價格均等化」的機制拉動了區域內的產業分工與貿易結構的轉型。

表2、東亞四小龍與中國對美元的匯率變化，1986-1998

年期	港幣	新加坡幣	韓圓	台幣	人民幣
1986	7.803	2.177	881.45	37.838	3.453
1987	7.798	2.106	822.57	31.740	3.722
1988	7.806	2.012	731.47	28.588	3.722
1989	7.800	1.950	671.46	26.407	3.765
1990	7.789	1.813	707.76	26.893	4.783
1991	7.771	1.728	733.35	26.815	5.323
1992	7.741	1.629	780.65	25.164	5.515
1993	7.736	1.616	802.67	26.387	5.762
1994	7.728	1.527	803.45	26.457	8.619
1995	7.736	1.417	771.27	26.486	8.351
1996	7.734	1.410	804.45	27.458	8.314
1997	7.742	1.485	951.29	28.703	8.290
1998	7.745	1.674	1401.44	33.456	8.279

資料來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of Developing Asian and Pacific Countries, 1999.

四小龍（香港除外⁽⁶⁾）的出口利潤因幣值上升被壓縮，使得勞力密

⁽⁶⁾ 香港匯率是釘住美元，所以在這段期間相對於日本與其他小龍的貨幣其實是貶值的，但是由於人民幣在1990年代初期的大幅貶值，加上香港與中國

集生產部門必須移往國外，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留在國內的產業則必須進行產業升級，也就是往更高附加價值的生產工序移動。因此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開始加強對四小龍的資本輸出，在1990年代之後則轉向東南亞及中國⁽⁷⁾（如表3）。四小龍則在稍後，也就是1991到1993年之間開始提高他們對中國的投資（如圖4）。由於這種FDI的成因一開始是第一與第二梯隊的雁子們的勞力密集產業無法承受升值所帶來的成本上升而尋求海外生產基地，因此這種投資遂帶動了被投資國對投資國原物料與資本財的需求，導致了亞洲區域內貿易額的增加，表現為某些學者強調的亞洲經濟區域化（regionalization）（Kwan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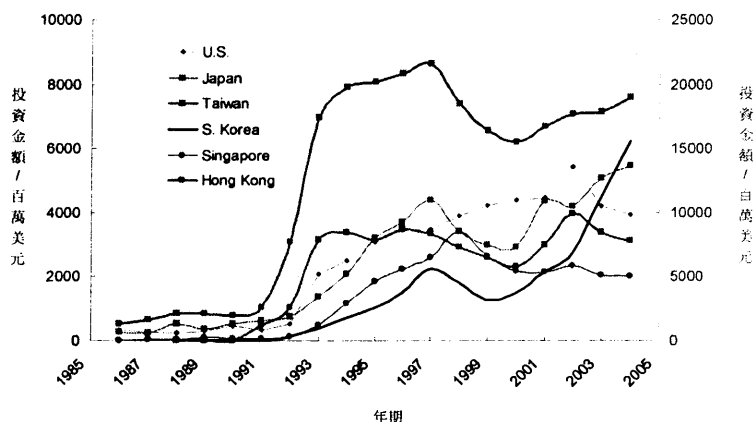
表3、日本對外投資情形

年期	Asian NIEs	ASEAN	中國	美國	歐洲
1985	5.9	4.9	0.8	44.2	15.8
1986	6.9	2.5	1.0	45.5	15.5
1987	7.7	3.1	3.7	44.1	19.7
1988	6.9	4.2	0.6	46.2	19.4
1989	7.3	4.1	0.6	48.2	21.9
1990	5.9	5.7	0.6	45.9	25.1
1991	5.3	7.4	1.4	43.3	22.5
1992	5.6	9.4	3.1	40.5	20.7

資料來源：依據Kwan, C. H. 1994.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ondon: Routledge, 頁102重新計算。單位：%。

長期特殊的經濟地緣關係，香港的對中投資與其他各國呈現類似的變化，而且投資幅度更大。

⁽⁷⁾ 即使如此，我們需注意的是，超過60%的日本對外投資仍然是集中在美國及歐洲。



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4-2005，單位：百萬美元。香港部分1990年以前包含澳門。

圖4、各國對中國的投資趨勢

這正是1990年代鉅量FDI湧入中國的「全球化現象」。關於國外直接投資大量進入中國一直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要素價格均等化來解釋的，但是僅以戰後的經驗就可以表明，全球國外直接投資的流動與分佈並不是按照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市場邏輯運行的，而是明顯地具有國際階層性。從1960年到1994年，全球國外直接投資總額（stocks of outward FDI）平均有97.88%是從已開發國家⁽⁸⁾流出的，而這些資金平均有四分之三是流入已開發國家（Held et al. 1999: 247-249）。另外，我們根據聯合國的資料重新計算，截至2004年，國外直接投資總額有88.47%是從

⁽⁸⁾ 這裡的已開發國家指的是美國、法國、德國、荷蘭、瑞典、瑞士、英國、日本。

已開發國家流出的，流入已開發國家佔72.73%。這些數據顯示了全球FDI的跨國移動主要是在已開發國家內部進行的活動。⁽⁹⁾因此，中國為何能夠比其他眾多的開發中國家吸收更高比例的FDI，是需要一個比「要素價格均等化」更複雜的說明。

以全球化口號最盛行的最近十年（1994-2004）為例，它是中國的外資輸入增長最快的時期，在這段期間，國外直接投資也的確是有9.41%轉而由開發中國家流出，然而事實上，這些跨國資本的新提供者有6.5%（也就是佔所有從開發中國家流出的FDI的69.1%）是集中在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這四小龍（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換言之，FDI提供來源從已開發國到開發中國家的略微分散反映的不是全球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是東亞四小龍在世界體系中位階的上升，而東亞四小龍的位階上升對中國吸收高比例的FDI則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以1990-1998的投資集中度指數（investment intensity index）⁽¹⁰⁾為例，前六名分別是菲律賓、香港、台灣、泰國、新加坡與韓國，美國僅僅排名第33名，日本則遠遠落後為第87名。⁽¹¹⁾如果我們因為菲律賓與

⁽⁹⁾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 Publications, 2005), pp.257-296.

⁽¹⁰⁾ 投資集中度指數是指甲國對乙國的投資比例除以甲國對全世界的投資比例，也就是 $\frac{I_{ij}}{I_{*j}} / \frac{I_{i*}}{I_{**}} * 100$ ，其中 I_{ij} =i國在j國的投資， I_{*j} =流入j國的投資總額， I_{i*} =從i國流出的投資總額， I_{**} =全世界投資總額。

⁽¹¹⁾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2)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 OECD Publications, pp. 343-345.

泰國的數額太小⁽¹²⁾而不列入考慮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FDI大量地流入中國主要並不是因為資本在全球性的跨國流動所致(因為事實上資本並未真正的全球性跨國流動)，而是得力於東亞四小龍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上升之後所進行的資本輸出。

關於為何是四小龍，而非其他已開發(如美國與西歐)國家，構成對中國投資的主力，OECD則提供了一個更細緻(sophisticated)的「要素價格均等化」解釋，因而對國際資本的流動階層也更加露骨地揭示，值得詳細引述：

普遍上我們都同意，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的經濟與技術水準高於中國，而低於已開發國家。…因此，許多勞力密集的產業已經失去競爭力，而海外投資成為這些產業利用已累積起來的管理、技術與出口市場的一種手段。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勞力密集生產技術與穩固建立起來的國際出口市場十分適合來開發中國在勞力密集產業上的比較優勢，和提升中國的出口。…

有許多理由使已開發國家對中國保持著低度的國外直接投資，除了已開發國家與中國相對巨大的經濟與技術差距，以及遙遠的地理距離外，也有許多重要的因素阻礙著已開發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首先，已開發國通常擁有先進許多的科技與生產技術，由於中國對智慧財產權薄弱的法律保護架構，使得他們不願意投資中國。第二，服務業在已開發國是非常先進的，它是過去十年中，已開發國家的全球國外直接投資中

成長率最高的部門，而中國的服務業是不對外開放的。第三，大型的跨國公司(MNEs)是已開發國進行國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承載者，而跨國併購則越來越是他們進行國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然而，併購在中國是在非常嚴厲的限制下，以一種實驗性質的方式為之。⁽¹³⁾

OECD最後呼籲，「國外直接投資來源的分散化不僅對中國在數量上吸收更多的資本流入是必要的，而且對中國吸收更優質⁽¹⁴⁾(higher quality)的國外直接投資也是必要的」，因此，降低本國的管制，接受以開發國家主導的國際多邊組織(如WTO)所設定的規範，就成了中國「向上提升」極為重要的機會。⁽¹⁵⁾

OECD的說法其實委婉地道出了，全球國外直接投資其實沒有那麼「均等化」，而是明顯地由一個的技術、投資形式、法律制度所搭建起來的國際階層體系在支配的。在這一體系中，中國雖然有發展勞力密集產業的比較優勢，但是這種廉價的勞動力卻不夠好到吸引「優質」的已開發國家資本。過去因為四小龍位居於「中間」，所以對中國的投資比「上面」與「下面」的國家都「剛好」更適合對中國的投資，因此有異乎尋常的比例。這種國際階層體系，正是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主義運作中「閒人莫進的機房重地」，規定著市場經濟的利潤流動方向。因此，

⁽¹²⁾ 以2004年來說，即使不計入維京群島與開曼群島對中國投資的部分，菲律賓的對中國投資額也僅達到香港的1.2%，台灣的7.5%，而泰國則只達到香港的0.9%，台灣的5.7%。中國國家統計局(2005)，《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¹³⁾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2)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 OECD Publications, pp. 343-345.

⁽¹⁴⁾ 粗體標示為作者所加。

⁽¹⁵⁾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2)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 OECD Publications, p. 345, 重點為作者所加。

從OECD的解釋中，我們就可以理解，雁行秩序的形成所牽涉到的，不只是區域間根據比較利益進行產業分工的關係，同樣重要的是形成此一分工位階背後的權力支配關係，而這種權力支配關係在主流經濟學解釋中，經常被比較利益的層級，或者乾脆當作「非經濟因素」而消音了。我們認為，只有同時考慮政治權力與資本的共同作用，才能理解全球化下東亞的發展特質，也才能理解中國未來發展的結構性挑戰與機會何在。

東亞雖然進行有效的生產力重組，然而拉動此一區域化的經濟成長的動力卻依然是來自美國市場的貿易順差。表四是2004年東亞各國對美國出口佔國內總出口的比例以及排名，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國市場對東亞各國出口的重要性都在前三名之內，其出口比例佔各國總出口大致上都在15%-20%以上。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出口大國中國（佔世

界總出口6.46%）與日本（佔世界總出口6.15%），它們在吸收東亞其他國家的出口後（區域化的主要動力），卻都以美國市場作為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

因此，對中國的投資主力來自東亞四小龍，而四小龍之所以能夠對中國進行資本輸出乃是因為：（1）得力於戰後美國形塑的雁行秩序，使得它們可以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更快速的資本積累；（2）1980年代中期美國為改善其赤字問題而進行的區域幣值調整。歸根結底，這兩個因素都是在戰後美元本位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下，美國不斷發行美元所造成的結果。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能明白當中國由於地緣因素大量接受四小龍的資本時，它同時也接受了雁行秩序中「出口帶動成長」在國際政治經濟結構下的限制：對美出口的依賴和過高的美元儲備。然而，另一方面，中國卻具有一個與東亞雁群經濟體十分不同的特質，那就是它的經濟規模。東亞雁群經濟體可以從邊陲地位上升到半邊陲國家而不至於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產生結構性的衝擊，但是中國單純在貿易與資本累積的量的增加就牽涉到全球資本主義運作的重新安排，這是我們在底下分析「中國崛起」的重點。

四、「中國崛起」的機會與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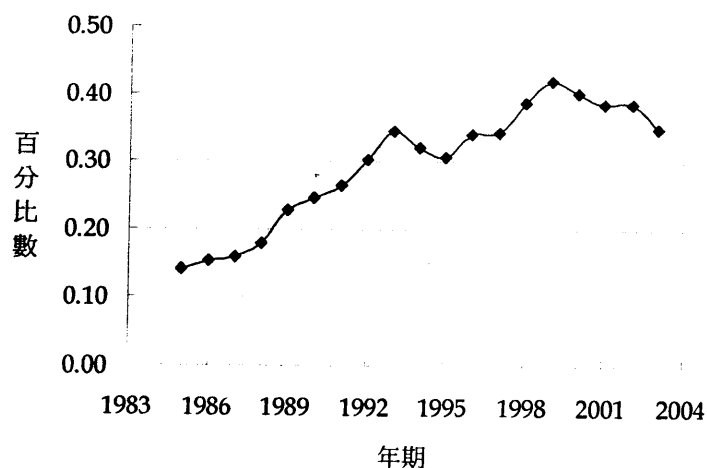
雁行秩序的轉型使得日本與四小龍對東南亞與中國輸出FDI，它在造成前者對美國市場的出口下降的同時，也提高了後者對美出口的依賴。根據美國自己的統計規格，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中國總出口額在

表4、美國市場佔東亞各國出口比重與排名，2004年

國家	佔國內總出口比重 (%)	排名
中國	21.1	1
日本	22.7	1
韓國	16.9	2
台灣	16.3	3
香港	16.5	2
新加坡	13.0	3
印尼	16.3	3
菲律賓	18.2	2
馬來西亞	18.8	1
泰國	17.0	1
越南	19.6	2

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WTO），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statis_e.htm。

1999年達於42%的高峰，迄2004年仍達於三分之一（圖5）⁽¹⁶⁾。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成長來自外資與出口，那麼FDI與貿易順差的累積就是中國成長的關鍵，「出口帶動成長」也的確引導了中國在1990年代以來的傲人成長，並進而提升著中國的綜合國力（表5）。然而「出口帶動成長」能否持續下去，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是必須視美國市場的購買力而定。也因此，中國未來經濟的持續增長也會同樣面臨雁行秩序的國家過去所遭遇的基本難題：「美元循環」所產生的衝擊。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4-2003；U. S. Census Bureau, 1985-2003。

圖5、中國對美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例，1985-2003

⁽¹⁶⁾ 在此，「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總額包括了部分的香港對美出口，其理由是以香港的經濟規模並不足以完全吸收中國對香港的出口，因此是以香港作為轉運站的對美出口，請見U. 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 Data Dissemination Branch, Washington, D. C. 20233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2006>)。

表5、中國經濟成長指標，1978-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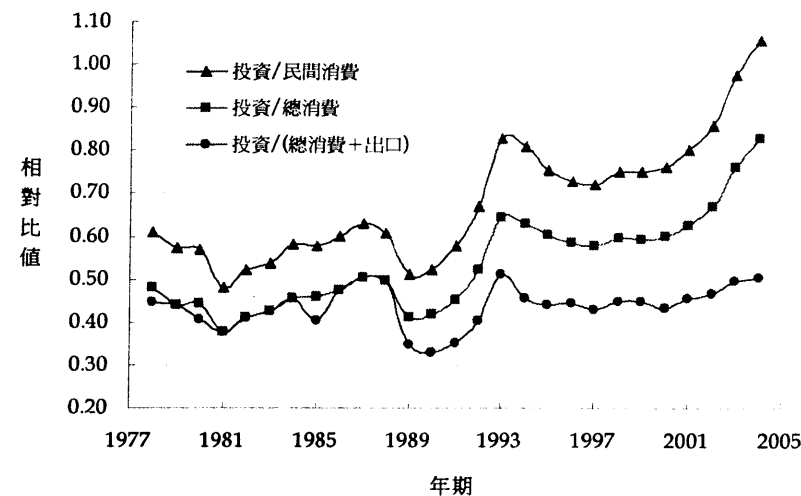
年期	國外直接投資 (億美元)	貿易/GDP (%)	貿易收支/GDP (%)	外匯存底 (億美元)	GDP的成長 (1978=100)
1978	-	0.0980	-0.0055	1.67	100.0
1979	-	-	-	8.40	107.6
1980	-	0.1262	-0.0061	-12.96	116.0
1981	-	-	-	27.08	122.1
1982	-	-	-	69.86	133.1
1983	-	-	-	89.01	147.6
1984	-	-	-	82.20	170.0
1985	16.58	0.2305	-0.0501	26.44	192.9
1986	-	-	-	20.72	210.0
1987	-	-	-	29.23	234.3
1988	-	-	-	33.72	260.7
1989	33.92	0.2458	-0.0144	55.50	271.3
1990	34.87	0.2998	0.0222	110.93	281.7
1991	43.66	0.3343	0.0198	217.12	307.6
1992	110.07	0.3424	0.0087	194.43	351.4
1993	275.15	0.3254	-0.0203	211.99	398.8
1994	337.67	0.4359	0.0099	516.20	449.3
1995	375.21	0.4019	0.0240	735.97	496.5
1996	417.25	0.3555	0.0150	1050.49	544.1
1997	452.57	0.3622	0.0450	1398.90	592.2
1998	454.63	0.3427	0.0459	1449.60	638.5
1999	403.19	0.3643	0.0295	1546.75	684.1
2000	407.15	0.4390	0.0223	1655.74	738.8
2001	468.78	0.4335	0.0192	2121.65	794.2
2002	527.43	0.4903	0.0240	2864.07	860.1
2003	535.05	0.6004	0.0178	4032.51	941.8
2004	606.30	0.6980	0.0195	6099.32	1031.3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4-2005。

隨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展開，外匯儲備不斷節節升高，它一方面造成中國國內貨幣供給的上升與過度投資，另一方面卻積蓄了美元對人民幣的貶值力量。「出口帶動成長」使得中國產能的提高需要美國更高的購買力，但是美國的購買力卻在金融帳的節節升高下趨於疲乏，⁽¹⁷⁾這兩種相互作用的力量共同導致了中國可能面臨的產能過剩危機。

產能過剩就是市場上的購買力不足以完全消費投資所生產出來的商品，因此如果一個經濟體的固定資本投資除以消費是呈現節節上升的趨勢，那麼，我們可以說，該經濟體正逐漸地累積著產能過剩的壓力。底下我們就以中國歷年來的固定資本形成除以消費來觀察中國是否有產能過剩的跡象。我們首先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除以國內居民消費，可以得到明顯逐漸上升的趨勢。其次，我們再加上政府消費，也就是固定資本形成除以國內總消費，其結果依然得到一個上升的趨勢。只有當我們將固定資本形成除以國內總消費以及出口時，中國的產能才得到平衡（圖6）。換言之，中國的產能釋放主要一直都是依靠國際市場的消費來實現其資本循環，而其中又以美國市場佔最大份額，也就是說，在現

階段中國經濟的增長要依賴世界市場，而世界市場則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美國持續的消費。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4-2005。

圖6、投資與消費的關係

如果說中國經濟崛起的真正意義在於世界經濟依賴中國的成長而成長，而不是目前中國依賴世界經濟的情況，那麼，中國就必須減輕或避免世界經濟加諸於它的結構限制。換言之，長遠來看，中國經濟能否崛起的主要關鍵是中國能否走出「美元循環」的基本結構，成為世界經濟規則的制訂者而非跟隨者，而其出路則在於提高中國國內的消費能力，使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崛起」會要求中國從目前的「出口帶動成長」的發展模式轉變成為依賴內需市場成

⁽¹⁷⁾ 美國的經常帳赤字雖然在1986-1990年因為廣場協定的簽署而縮小，但是在1990年以後則開始另一波規模更大的赤字成長，每年的債務以GDP的4%到5%的速度往上堆疊，也就是約等於每小時發行五千萬的紙幣交換各國對美輸出的產品（Duncan 2004: 71-73），根據WTO的統計，2004年美國的經常帳赤字已達於6680.8億美元，約等於每小時發行七千六百多萬的紙幣交換各國對美輸出的產品（<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CountryPFView.aspx?Language=E&Country=US>）。從「美元循環」的反覆呈現貶值的趨勢來看，美國的主要貿易順差國，特別是中國，勢必又要面對美國要求他們升高幣值的壓力。

長的模式。準此而言，一個比較適切的「中國崛起」指標應該是中國GDP與內需市場的同時增長，單純的FDI、貿易順差或國際儲備的增加非但不適合作為中國經濟崛起的指標，反而只是反應中國在「美元循環」的基本結構下必須面對的難題。

以中國佔有世界20%的人口來說，中國內需市場是具有巨大經濟規模的潛能。然而，擴大國內的有效需求卻必須遭遇一個基本結構轉型的問題，那就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分配不均也因為出口導向的資本主義發展而沿著城鄉、區域、與新社會階層化的形成逐漸拉大，這一分配不均如果持續下去，將會關鍵性地阻礙了中國內需市場的擴大。

首先，我們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與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的比值來看，自1990年以來城鄉消費能力的差距是日益擴大(如圖6)，從1990到2005年之間其差距從2.19倍上升到3.29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然而，這個數字很可能是被嚴重低估的，城鎮居民所享受的福利如醫療服務、教育、住房補助等非貨幣收入會顯著地抵銷了城鎮居民原本應有的支出水準。聯合國出版的《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就引用中國學者的估算指出，以2002年為例，這部分的補助所增加的收入即高達3600-3900人民幣，⁽¹⁸⁾這個數目如果屬實，那它就佔當時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8177.40元)的44%到48%，更超過當年農村居民人均總收入(3448.62元)。

雖然城鎮居民享有比農村居民更優越的社會福利，但是城鎮人口本

身的財富分配也日趨不平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調查資料顯示，2002年10%的城鎮人口擁有24.4%的收入，⁽¹⁹⁾另外，根據中國統計局自己發佈的資料，這個數字在2006年已經上升到45%。⁽²⁰⁾如果我們檢視這段期間節節上升的下崗與失業人數，這一分配的不平均趨勢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即使GDP成長的速度保持在7-8%以上，根據中國2004年勞動統計年鑑，城鎮失業率也還是從1993年的2.6%上升到2003年的4.3%，如果加上下崗工人，有些研究估算指出，城鎮失業人口早在2000年可能已經超過11.5%。⁽²¹⁾

最後，即使在全國城鎮人口中，財富仍然往少數的沿海中心都市集中，人均GDP排名前十名的城市由南而北是，大連、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寧波、廈門、廣州、深圳，無一例外地皆是沿海城市。我們根據2005年中國統計年鑑的GDP數據推算回去，2004年全國人均GDP為10561元，而這排名前十名的城市人口佔全國人口9.2%，其人均GDP卻高達59192元，這也就是說，2004年佔全國人口9.2%的城市，其GDP總值即佔據了全國GDP的51.56%。全國經濟重心不成比例地集中於沿海的中心都市，這其實是再一次反映了中國經濟成長嚴重依賴出口貿易的結構特性。

區域、城鄉、與逐漸拉大的社會階層化形成三條主要的切割線，使得1990年代以來中國財富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同樣快速地集中在沿海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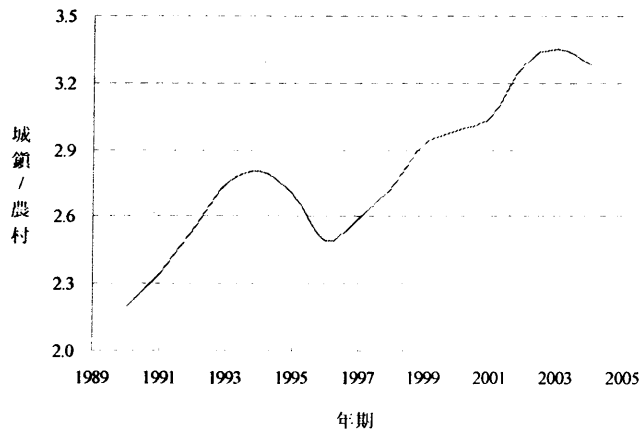
⁽¹⁹⁾ 同註28。

⁽²⁰⁾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7/27/Content_3273982.htm.

⁽²¹⁾ Xue and Zhong, "Unemployment, Poverty and Income Disparity in Urban China,"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17, No. 4(2003).

⁽¹⁸⁾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Development with Equality*, (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 p. 27.

華都市的少數人手中，它是構成了中國擴大內需的主要障礙之一，因為鉅額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時，雖然有小部分的財富會被用於較奢華的消費，但是大部分的積累依然會經由儲蓄轉化成投資的資本，而不是成比例的消費力。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90-2005。

圖7、城鎮與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的比值

因此中國崛起的關鍵因素應該是提升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至少有兩種作法可以往促進這個目標的達成：（1）更充分的就業以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達到更高比例的消費力；（2）以及更完善的社會安全制度，以便經由增加政府支出來提高國內需求，同時降低過高的儲蓄，使之轉化為消費力。更充分的就業牽涉到下崗工人的就業問題與「農民工」的合法化，後者牽涉到的是戶籍制度的變革，這將直接影響到城市居民長期以來的優勢地位，根本性地重構中國的階層關係。更完善的

社會安全制度應該頗有可為，因為目前各級政府的社福支出不超過GDP的3.5%，還有甚大的成長空間，但是，這些支出（如教育、退休、健保）的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進行財富更平均的社會分配，代表國家的政治菁英必須與經濟菁英進行利益的結構性調整。簡言之，中國崛起所需要的消費力持續增長必然牽涉更深層的社會與政治改革的主要挑戰。

除了經由提高國內消費力以減輕對外國市場的依賴，中國崛起所必須克服的另一個挑戰是對外的技術依賴。出口導向發展至今已為中國累積了上兆美元的外匯存底，它對人民幣升值造成結構性壓力，而一旦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出口導向的產業利潤勢必被壓縮，其中勞力密集產業將受到最大的衝擊。換言之，發生於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的產業結構調整壓力應該也將會在中國重現。

然而，這種依賴外資與出口的發展模式是否帶給中國相應的技術升級，仍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議題。事實上，中國的科技支出（science & technology expenditure）佔GNP的比例從1991年的8%下降到1996年的1.37%，到1999年也只有恢復到1.57%的水準。而研發支出（research & development expenditure）在整個1990年代平均只佔GDP的0.7%，遠少於OECD國家的2.3%，甚至低於印度的0.9%。另一方面，中國在1990年代的科技出口平均年增率為28%，進口年增率為44%。科技貿易量的大幅增長與研發、科技支出近乎水平的延宕，顯示中國的整體技術發展是以進口替代國內研發。而且60%的高科技技術進口集中於外國投資企業中，國有企業占37%，其他企業只佔3%。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在1999年出版的科技競爭力報告，1996年中國企業花費了人民幣322億元在科技進口上，其中只有14億元適用於技術吸收與擴散（OECD 2003:

195-208)。這些統計數字顯示，雖然中國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上，大幅吸收國外直接投資並經由長期的貿易順差累積了可觀的外匯，然而在全球的生產體系中，中國似乎還是處於依賴外國的技術進口。

誠然，產業升級本身並不能保證中國走出「美元循環」的格局，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即使產業水準與美國並駕齊驅，甚至於某些方面超越美國，但是日本的發展依然是在「美元循環」的格局運作。⁽²²⁾不過，日本的產業升級幫助它持續成長，積累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財富，使得日本在「美元循環」的對美融資上取得舉足輕重的位置，從而增強它與美國的協商力量。日本的根本弱點是戰後對美國的軍事依賴，導致於在外交上惟美國馬首是瞻。這點對中國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如果中國取得類似日本的財富與技術能力，加上獨立於美國的軍事能力與外交政策，可以想見的是，中國將會大大增強它在改變國際權力均勢（balance of power）以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力量，也就是說，產業升級將有助於增強中國改變「美元循環」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力量，因此，中國的崛起的另一個關鍵性因素將取決於產業技術升級的速度。

五、結語

由於中國的規模巨大，它在世界經濟結構中的浮沈將直接改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資源配置，因此中國是否崛起必須放置於世界經濟與權力結構的可能改變來評估。在這篇論文中，我們論證中國的崛起是植根於「全球化」的結構轉型，然而，與一般主流的解釋不同，我們認為，

把全球化當成全球要素價格均等化是一項迷思，推動全球化現象的核心動力必須從美元金本位轉變為後來的美元本位來理解。美元金本位賦予了美國發行超過其黃金準備的美元，美元本位則更進一步地擴大美國從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鑄幣利得（seigniorage），美國透過這一金融優勢使得全球的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美國市場的增長上。

即使美元本位賦予美國全球獨一無二的金融優勢，美國巨大的經常帳缺口也不可能一直藉由金融帳的融資來彌補的。長期而言，為了改善巨大的經常帳赤字，美國只能經由提高貿易順差來改善，但是，這就意味著世界經濟必須進行一個根本性的翻轉，在美國之外出現一個巨大的市場來取代美國目前的角色。如果我們把國際儲備可以當成潛在的消費力的話，那麼東亞，特別是日本與中國，就是頗富希望的潛在候選者。然而，這意味著日本或中國都必須逆轉目前的出口擴張發展。就中國而言，要達到這一目標，除了必須進行高速度（相對於美、日核心國家）的產業升級，以進一步提高資本積累外，還牽涉到更深層的社會與政治改革，才能將過高的儲蓄轉為消費力，而其最終目標則是要走出以「美元循環」為動力的出口帶動成長模式，使中國的長期發展不再受限於美元本位的基本結構，而能改變世界經濟規則使之有利於中國自身發展之所需，這才是「中國崛起」時代的真正到來。

⁽²²⁾ 感謝評審人指出此點，幫助本文做了進一步的釐清。

參考書目

- 大前研一 (2003), 《中華聯邦》。台北：簡周。
- 中國國家統計局 (2005), 《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李察·鄧肯 (Richard Duncan) (2004), 《美元大崩壞/深度解讀「美元危機」的成因、威脅與對策》。譯者：李璞良。臺北：早安出版社。
- Arrighi, Giovanni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Verso.
- Borden, William S. (1984),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1955*.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0),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wynne, Robert N. and Cristobal Kay (1999), *Latin America Transformed: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Arnold.
- Held, David, Anthony G.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rst, Paul and Grahame Thompson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ojima, Kiyoshi (1986), "Japanese-Style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14 (Spring).
- Kwan, C. H. (1994),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ward a Yen Block*. New York: Routledge.
- Lardy, Nicholas R. (2002),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1998),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1987),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1st Five-Year Plan. In Den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
- McMichael, Philip (2000),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A Global Perspective*. 2nd ed.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 Nurkse, Ragnar (1961),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Growth", in Gottfried Haberler and Robert M. Stern (eds) *Equilibrium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ECD (2002),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 OECD Publications. 中譯本，胡鞍綱、胡宇光主譯 (2004), 《世界經濟中的中國：國內政策的挑戰》。北京：清華大學。本文引用頁數為英文本頁數。
- Ohmae, Kenichi (1995),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 Prebisch, R. (1950),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Rapley, John (1996),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Ruggie, John Gerard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the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 Selden, Mark (1997), "China, Japan, and the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1945-1995."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inger, H. W. (1950),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 Publications.
- Walters, Robert S. and David H. Blake (1992), *The Politics of Global Economic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Globaliz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Hung-Jeng TSAI*

Abstract

Evaluation on the rise of China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the potent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economy and power because China's large size will directly change resource reloc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China's rising is rooted i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ization'. While mainstream theory interprets globalization as the consequence of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we argue that dollar standard is the main dynamics for globalization as we have seen today. Dollar standard empowers the U.S. financial muscle by which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s established on the growth of the US market. The dollar crisi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80s induced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Latin America on the one hand; it also pushed reg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of East Asia on the other. Thi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channels huge export-oriented capital into China and critically contributes to China's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since then. We argue, nevertheless, that China's rising has to rely on further industrial upgrade and domestic market more than that of the U.S. To achieve this long-term goal, China must carry out deeper soci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order to transform savings into consumpti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 dollar standards, East Asian regionality, dollar cycle, overproduc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ology, Nan-Hua University

《思與言》雜誌簡介

思與言雜誌是一群關懷國事、熱愛學術的年輕朋友創辦的。這些朋友大多數是在教育界或學術研究機構工作，他們辦這份刊物的目的，一者希望為國內學術界提供一個發表論著的園地；一者希望為國內學術界介紹國內外的學術思潮。

《思與言》雜誌是一本包涵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術性雜誌，自民國五十二年發行至民國九十四年的第四十四卷第四期為止，共發表了一千多篇的論著，這些文章分別屬於文學、歷史學、哲學、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教育學、心理學、行政學、外交學等純學術性論著。長久以來，《思與言》雜誌的奉獻與努力，實已獲得海內外學術界的認同與肯定。《思與言》所引介的學術理論，也刺激了國內的學術研究風氣，提昇了研究水準，所刊登之論文經常為學術界所引用。並為國內外圖書館必備之學術論文研究參考資料。

《思與言》目前已出版至第四十四卷第四期資料豐富，立論精確。本刊誠摯的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與愛護，讓本刊得以繼續出版。

本刊售價如下：

一般訂戶	全年（四期）	1200 元
學生訂戶	全年（四期）	600 元
零售	每期	300 元

本刊四十年全套雜誌發售

第1~40卷（散裝本）共計四十卷

全套售價NT\$100,000元

優待售價NT\$80,000元

洽購電話：2653-3139

郵政劃撥帳號：19790638

戶名：魏千峰

存書不多，歡迎洽購，以免向隅